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459頁。

王明珂《華夏邊緣》一書的思路和研究取向、研究方法，主要體現在作者要解答的一個具有一般性意義的問題上——「爲甚麼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爲了解答這一問題，作者以巴斯（Fredrik Barth）的族群理論爲藍本，結合了心理學有關人類社會「記憶」的經典概念（如「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試圖建構起一套關於「邊緣研究」的模式，替代以「溯源研究」爲特徵的傳統民族史的套路，並以此爲基礎解讀歷史中的「族群本質」（ethnicity）。「邊緣研究」所面對和利用的素材雖然與「溯源」研究一樣，但對其意義的解讀卻大異其趣。如在運用考古學資料上，「邊緣研究」的考古學基礎主要建立在「生態考古學」而非「器物學」上；歷史文獻也被當作一種具有「合理化」特性的、隱含着某種特定時空中利益關係和權力結構的「社會記憶」來解讀，而非只是對之做「去僞存真」的考證。這也是作者貫穿全書的理念。

在以「生態考古學」描述了「華夏生態邊界的形成」之後，作者把重點放在對「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的分析上。例如在探討周人與華夏形成的關係時，作者著重對周人的族源傳說做了歷史記憶的詮釋，認爲包含帝嚳的商、周族源傳說的意義在於，它透露了在華夏形成的過程中，通過對商、周族源的再詮釋，以共同的族源記憶將商人與周人結合在一個「我族」的範疇之中；另一方面，在華夏自我意識建構的同時，需要豎立一個異族（otherness）的對立面以強化我族意識，東遷周人的西方異族意識也在生成並發生着微妙的變化，隨着周室政治制度的確立、秦人的華夏化與驅戎，華夏與戎之間的模糊界綫最終被消除，「戎」完全成爲西方「野蠻人」的代名詞，華夏西方族群邊界至此也完全建立。華夏西方邊界形成之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族群關係的變化而發生「漂移」的。這一點正是族群邊界的典型特徵之一，它反映的並不僅僅是「民族遷徙」的「歷史真實」，而更多是華夏「異族」觀念的變化，作者指出，羌人及其歷史記憶就是這樣的例子之一。

作者從漢人形成及漢代中國人的邊疆異族意象的角度，分析了華夏邊緣明確化、固定化的歷史背景，以及由華夏對邊緣族群的「異族意象」與其「自我意象」所塑造的不同族群關係和不同性質的華夏邊緣。由於「異族意象」的獲得存在某些主觀標準上的差別，如生態經濟及生活方式的差異、文化距離感的遠近、社會與政治傳統上的迥異等，在此基礎上建立的華夏邊緣因而也有不同的性質和

類別，對不同的華夏邊緣的政策和待遇也相應地有所不同。在邊緣異族被一種較為程式化的意象所定義及其所構築的「民族關係」的模式逐漸成爲內在化的「心理構圖」時，一方面，漢的擴張漸趨達到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態地理極限以及帝國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極限；另一方面，「中國人」的認同也逐漸形成了邊界的穩定性。在此，作者進一步指出，史籍中所見對邊疆四裔、外邦異族的「知識」建構（如關於「奇風異俗」、「奇珍異產」等），不僅是用以辨識他者的素材，同時也具有凝聚自我的功能，「華夏」、「中國人」、「漢人」需要「異質化」的邊緣而不是完全依賴內部的文化一致性來維持自身的認同邊界。

在討論「華夏族群邊緣的維持與變遷」時，作者以羌族的歷史記憶和臺灣的族群經驗爲例，對這一現象做了深入剖析。通過對松潘地區、茂縣、汶川、理縣地區和北川地區羌族的考察，作者認爲，羌族的歷史記憶包含了三個不同的層次：一是各溝村寨的「兄弟起源故事」，它以宣稱的血緣關係來維繫一種最基本的「根基性情感聯繫」（*primordial attachment*）；二是更大地區範圍的「木姐珠與熱比娃」或「羌戈大戰」故事，它也強調成員間的共同祖先和血緣聯繫，但由於它是跨溝、寨的，因此它的普及和傳承需要依賴某些特殊人群（地方權威）與某種特定的儀式（端公儀式）；三是漢人文獻中關於「羌人」的「歷史」故事，這些故事由於被經典化而成爲「歷史知識」，因此其傳遞與詮釋權掌握在「羌族知識分子」手中。這些不同層次的歷史記憶，對於不同的個人、次群體在不同情境下的認同具有不同的意義，它們之間既可以是一種共時性的包含疊壓關係，也可以表現爲一種歷時性的變動過程。換句話說，一個統一的「羌族社會歷史記憶」並不存在，諸如「被打散的曾經強大的羌族」、「拯救國家危亡的羌族」或者「安守本分、不謀華姓的羌族」、「受漢人欺騙而被迫住在山上的羌族」等等，都是這些記憶的內容。儘管他們在「訴說過去的聲音」時，在溝寨間、城鄉間、地方群體間和社會階層間，在不同的歷史境遇下，會有強弱之別，但一個「共同的羌族歷史文化」的建構仍然是許多人追求的目標。因此，造成並強化羌族認同的「共同起源」，並不是他們自然產生的歷史記憶，也不是優勢族群（漢族）強加給他們的記憶，而是他們與漢族之間及其內部各次群體之間，在現實族群關係的利益抉擇下對於「過去」的選擇、爭辯與妥協的結果。

對於習慣於傳統的中國民族史問題意識、研究路徑和敘事模式的讀者來說，對於長期受某一種「範式」規約的中國民族史學界來說，本書的研究都是相當「另類」的。儘管從整個國際人類學界的發展動態來看，這類民族史（*ethnohistory*）的研究並不少見，本書的研究方法也算不上是作者的獨創，但是，就中國民族史研究而言，選擇時空跨度如此之大（時間上縱跨新石器時代

至近現代，空間上涵蓋整個中國）、以整體的「中國人」（甚至超越了「中國人」）為對象，同時又要兼顧某些族群的精細考察，特別是要面對如此浩瀚的文獻史料以及如此「經典化」的「歷史」，這對於一心謀求「情境化」的歷史解讀的本書作者來說，仍然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的研究無疑是成功的，不少觀點都顯露出作者在跨學科視野之下的洞見。

概言之，本書的研究反映了作者的兩個基本關懷：一是對傳統中國民族史「溯源」研究的反思，並提出「民族史的邊緣研究」的研究模式。作者認為傳統民族史的套路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研究者受制於某些基本假設，而這些假設實際上是難以成立的；而邊緣研究則強調對「異例」的詮釋，強調從邊緣看中心的重要意義。二是在民族史的視野中體現對總體的歷史與分層的歷史的兼顧，強調了歷史的「典範觀點」與「邊緣觀點」的差異和互動關係。儘管因涵蓋面和側重點的關係，本書的研究和敘述難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過分強調族群認同的「工具性」，對「資源」概念運用有失偏頗，以及宏觀的中國大歷史與微觀的族群史、生活史的配合問題等等，但它在中國民族史的理論、研究框架和方法論的許多方面，如邊緣研究、人類學族群理論與社會心理學、歷史學（年鑒學派的概念和方法）的有機結合，以及文獻的田野研究等等，都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啓發意義的。

黃向春

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濱島敦俊，《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と民間信仰》，東京：研文出版社，2001年，iii，443，338頁。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認識到，共同的信仰，不僅是促使農民形成社會共同性的重要契機，也是集團「歸屬意識」的外部表現。與此相關的衆多優秀成果在華南研究的論著中得以充分體現，相對而言，有關江南地域的研究顯得勢單力薄，絕大多數學者所津津樂道的，仍不離以水利、徭役、商品生產等為紐帶形成的「顯而易見」的共同體。濱島敦俊卻堅信，在江南民間信仰和祭祀中，同樣存在着共同性的組織和共同的活動領域，農民日常生活的諸多關係均可以在其中得到反映。他在研讀同治《雙林鎮志》和鄭光祖的《一斑錄雜述》時，發現了重要綫索：19世紀中葉進行抗租鬥爭的佃農們，以「村」或「村社」為單位，有着共同的信仰，他們在行動以前，占卜於神廟；而在鎮壓民間暴動時，官府不僅逮捕現世的領導者，還會捆綁同「暴徒」站在同一立場的冥界的地方神。濱島由